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

——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关键词] 商周时期; 政权更迭; 海岱地区; 文化格局; 变动; 商周分界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6)011-0015-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6.11.002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已有学者分别论述^①,但商、周之交文化格局的变动却鲜有论及,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研究商周政治、文化的变革均有重要意义。随着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以及权力动荡,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格局的变动。本文以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为大背景,以海岱地区为切入点,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材料,讨论商周王朝“东土”的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转变为周文化统治的过程。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尝试解决困扰学界已久的商周分界问题。

一、海岱地区晚商时期的文化格局

商文化在海岱地区的进入,是在二里岗上层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商文化开始全面侵入鲁北和鲁南地区。在鲁南的前掌大^②、北辛^③、尹家城^④、南关遗址^⑤、天齐庙^⑥、潘庙^⑦,鲁西南的安丘堽堆^⑧,鲁北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 13CKG013)和中国人民大学亚洲中心项目“早期国家化历程中的东亚模式——以商、周王朝为中心”(项目批准号:2016YYA05)成果。

[作者简介] 曹斌(1981-),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

①方辉《商王朝对东方的经略》,《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夏商周考古探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燕京学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④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⑤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⑥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4年第12期。

⑦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⑧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山东菏泽安丘堽堆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的大辛庄^①、南陈^②、前埠、唐山^③以及近海的阳信李屋遗址^④等都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此时期商文化虽然侵占了以前岳石文化固守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无法进入夷文化控制的胶东半岛。据北京大学61级弥弥组在寿光丁家店子至青州谭家坊弥河一段调查,以及萧家、张家河圈等处的试掘情况^⑤来看,商文化分布的并未跨过潍河。而夷文化在各地区的残留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辛庄遗址以夹砂红褐素面陶器为代表的“第二类遗存”仍占有相当比例^⑥,这也就是说夷文化在鲁北地区依旧有着相当的影响。但是鲁南地区却很难看到素面陶器的影子,商文化已基本替代夷文化,并影响到沂水流域^⑦。

进入晚商之后,海岱地区的商文化因素进一步加强,但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依然有所不同。鲁北地区的商文化在控制范围未缩小的前提下,统治明显加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晚商时期除殷墟商王陵之外的唯一一座四条墓道大墓在青州苏埠屯墓地出现,并且出土有象征军事统帅权的“亚醜”铭大型铜钺^⑧。围绕着苏埠屯墓地,亦发现有一批晚商时期的商文化遗存。潍坊后邓村墓葬出土的铜卣有族徽“夂”^⑨,铜觶、爵有族徽“夂”^⑩。桓台史家遗址除发现环壕、房基、水井等居址材料外,墓葬出土的商代铜容器上还有族徽“夂”、“鱼”、“箕”等^⑪。滨州兰家遗址出土了此时期的陶器和铜器材料,1件铜卣上有族徽“夂”^⑫。而更加内陆的章丘城子崖^⑬、邹平台头和东台遗址^⑭也都有明显的商文化性质的遗存。此外,渤海沿岸和莱州湾还发现有此时期的盐业遗址群,诸如刘集遗址群、北赵遗址群、坡家庄遗址群、南河崖遗址群、东北坞遗址群、大荒北央遗址群、双王城遗址群、王家庄遗址群、央子遗址群等^⑮。此前鲁北地区的中心遗址大辛庄遗址继续繁盛,仍有着铜器墓的发现,并有族徽“夂”。就在大辛庄遗址的周围,刘家庄发现有晚商时期的墓地,并出土有族徽“夂”^⑯。小屯遗址也曾出土一批铜器,其中的卣、觶都是殷墟四期的器形,卣上还有铭文“举祖辛禹亚预”^⑰。但是大辛庄遗址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等级不再是鲁北地区最高显而易见,遗址中夷文化的因素也迅速消失,不再有素面类陶器的发现。由于会泉庄遗址这

①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②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省茌平县南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③燕生东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东方考古》(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

⑤相关资料见于:张通《鲁北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从刘延常先生发表的该地区博物馆库房材料看,费县曹车遗址、苍山刘家堡、莒南虎园水库、沂源东安故城等都散见白家庄上层至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物。商文化既能控制鲁南地区,其可向西北挺进至沂水流域并非不可能,至少在缺少发掘品的情况下可以说商文化已经影响至该地区。材料详见: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东方考古》(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⑨曹元启、单煜东《坊子区院上遗址发现商代青铜器》,《海岱考古》(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韩明《山东长清、桓台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考古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18日第一版;张连利等《山东淄博文物精粹》,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⑪王思礼《惠民专区几处古代文化遗址》,《文物》,1960年第3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常叙政《滨州地区文物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

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版。

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平县文管所《山东省邹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⑭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⑮方辉《商王朝对东方的经略》,《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⑯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处单纯的夷文化遗址的发现^①,山东的一些学者也提出晚商时期商夷长期对峙的观点^②。考古材料显示夷文化此时期都退守在胶东半岛,以珍珠门^③和芝水二期遗存^④出土的乳状长袋足素面鬲、矮圈足素面簋为典型代表的夷文化牢牢控制着这一区。而这种东、西夷商文化对峙和沿海盐业遗存的商文化性质正说明商王朝册封如此高规格苏埠屯大墓墓主目的有二个,一是仰仗其军事力量抵御夷人的西进,继续加强对鲁北地区的控制;二是确保殷墟三、四期商王朝在西、南、北三个方向全面败退,且山西解州盐池失守的前提下^⑤,确保主要的盐业供给区渤海沿岸和莱州湾盐业的生产。

鲁南地区此时的遗存有所减少,相当于殷墟二期的材料还有发现,殷墟三、四期的材料已十分稀少,特别是可明确为殷墟四期的材料几乎不见。此前遗物还比较丰富的尹家城遗址、天齐庙遗址和南关遗址均不见晚商遗存的发现。潘庙遗址有一些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陶器,更晚的器形也未发现。前掌大遗址只有居址的材料中还出有少量殷墟二、三期的陶器^⑥和个别铜器^⑦,明确的相当于殷墟四期的器物基本不见。凤凰台遗址有少量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遗存^⑧。而关于泗水流域原定在商末的一批遗址,已有学者指出其年代下限均可进入西周^⑨,我们甚至认为其中属鲁南的遗址的时代基本均是西周早期而非商末。鲁西南的安丘堽堆遗址仍有少量本阶段遗物的发现,但是简报定在殷墟四期的器物都是地层所出,无明确单位。据鬲、甗等器物足部绳纹已经到底的特征看,这些器形可能也已进入西周,也就是说安丘堽堆遗址并没有殷墟四期的典型单位发现。鲁东南地区只有沂水信家庄发现有铜觚、爵和陶簋各1件^⑩,由于图片不清,大致判断铜觚、爵相当于殷墟二期前后,陶簋为本地文化因素的产物。有学者新近公布该地区晚商遗存28处^⑪,但仍然罕见典型的商文化陶片,出土铜器的遗存除费县双丘遗址采集的铜爵可早至晚商外,其余可能均已晚至西周早期。从区域系统调查的材料看,鲁东南仍是以土著文化为主^⑫,也就是说此时期商文化在鲁东南地区的影响已明显衰退。由于殷墟甲骨一至五期都有商王朝征夷方的甲骨出土,特别是第五期的帝辛十祀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征夷军事行动,其中涉及的地点此前学界多认为与海岱地区有关。但近年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明确指出属第五期卜辞的夷方与山东岛夷并无多大联系,其所指应为淮北,并对征夷路线做了详细考证^⑬。甲骨文呈现的情况与考古的发现正相一致。鲁北地区晚商属商文化军事控制区,夷文化被限定在了潍河以东的胶东半岛,而鲁南地区自二里岗上层始,夷文化因素已被逐渐肃清,晚商时期已经遗存凋零。鲁东南是土著文化的分布区,且看不出文化繁荣的迹象。在殷墟晚期商王朝政治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形下,商王似乎也很没有必要去征伐这样的区域。

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寒亭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潍坊会泉庄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方辉《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王锡平《胶东半岛夏商时期的夷人文化》,《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④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市博物馆《烟台芝水遗址发掘报告》,《胶东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⑤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夏商周考古探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⑦龙堽堆遗址因挖树坑发现铜器,村民上交7件,是否同一单位无法确定。但是铜甗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时期。资料见于: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1期。

⑧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⑨燕生东,王琦《泗水流域的商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多重建构》,《东方考古》(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8期。

⑪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东方考古》(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⑫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日照两城地区区域系统调查的新收获》,《考古》,2002年5期。

⑬李发《殷墟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

二、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西周早期文化格局的变动

在帝辛三十年,“小邦周”联合反殷集团在牧野一举击溃商王朝,从此政权更迭,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但是,周王朝在取得胜利后并未骄奢淫逸,重蹈商王朝的覆辙。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大举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采用直接分封诸侯的方式开疆扩土,而海岱地区就是周王朝的重点布局地区。

鲁南地区分封有鲁国、滕国两个姬姓封国。鲁国西周早期的都城遗存还未发现,但是在兖州李官早年就发现有“索氏”铜器^①,由于文献明确记载“索氏”为周初封于鲁的“殷民六族”之一,在西周后期的鲁故城内也分区埋葬着殷遗墓葬和周人墓葬,因此鲁国的始封地极有可能就在兖州的范围内。加上周边大墓的频繁被盗以及西周早期鲁侯鼎、簋的出现^②,更让我们相信以上认识。滕州的庄里西墓地发现有滕侯铜器^③,其旁还有滕国故城的发现^④,因此庄里西一带为滕国的始封地所在。在封建亲戚之外,周王朝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巩固统治,即册封殷遗贵族。不仅“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还将商末叛商投周的贵族加以册封。如文献中的封微子于宋,墙盘记载中对于烈祖的安排,考古发现的泾阳高家堡戈族墓地等。鲁南地区的前掌大墓地也正是此类性质的遗存。大约在商周之际,殷商大族——“史”鉴于商纣无道,和其他大族一样,叛商投周,进入滕州这片空虚地带,并在周初得到了周王朝的册封^⑤。而在鲁西南,文献记载有曹、邾、郛等姬姓封国。由于商末鲁南地区可能已经不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周初周王朝可以很顺利地分封鲁、滕等姬姓封国,册封“史”族至此,控制该地区。鲁北的情况有点复杂,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周文化因素陶器,虽达不到分段的程度,但是可以感觉时代略晚于鲁南西周最早的周文化因素陶器材料,这是因为周王朝对于该地区的控制之路与考古学文化在该地区的演进一样曲折。

在周初,由于周王朝刚刚取得天下,鲁北在晚商又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地区,族系关系复杂,并且是商王朝盐业的主要供给区,该地区对于周王朝而言既重要又棘手。同时,原先固守胶东半岛的东夷故族也试图趁乱突破潍河一线,向西侵占更多的领土,分封齐国就遇有“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的事件,周初鲁北地区也出现了此前消失已久的典型夷文化因素的夹砂红褐色素面陶器。考古所见西周早期更多的是夷文化因素对于鲁北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才弱势下去。所以,成王时期周王朝即对此地进行了大举征讨。除文献记载外,还有伐东夷组铜器铭文可佐证。除墜方鼎提到翦灭“莒”、“薄姑”外,成王时期的旅鼎、保卣都分别提到“伐反夷年”和“及东国五侯”。正是一系列的军事举动,局面才得以稳定下来。此前兴盛的遗址迅速由盛转衰,苏埠屯墓地不再见带墓道大墓的发现,大辛庄遗址或可进入西周,但是遗存数量已急剧减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昌乐、青州、章丘、济南、淄川一带都有西周早期偏早周因素陶器的出现,而临淄大城东北部的东古村村北发现有数件西周初年的车马器,临淄河崖头发现三座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器墓,其中1件陶簋的底部还有“侯”字^⑥。所以营丘的范围可能也就在北到临淄、南到淄川、西至济南、东至昌乐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以内。此外,齐国至晚还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设立了边防。太公封其庶子于此地,并筑一座小城保护贵族墓葬和祭祀区^⑦。就

①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②御雅居《吉金御赏(三)——王侯瑰宝》2014年版。

③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杜传敏等《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西周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⑤曹斌《前掌大墓地质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

⑥齐国历史博物馆《临淄文物集萃》,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⑦曹斌《莒国小考》,《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

在齐国之西,还有“逢”国^①在西周前期一直居于此地。而向东即便是影响范围,齐文化也没能越过前一阶段商、夷对峙的淮河流域。

胶东半岛晚商时期就是传统的夷文化固守地区,即便周王朝建立,鲁北分封齐国后,周文化对胶东半岛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只是绳纹装饰的出现,典型的周文化因素陶器在已有的发现中基本不见,这也涉及到胶东半岛地区文化格局转变的时间问题。在康、昭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就有许多关于继续征伐东夷的记载,如鲁侯尊“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甗鼎“王令遣戡反夷”、小臣懿簋“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保卣簋“毕伐东夷”、甗鼎“惟王伐东夷”的记载。以上部分铜器器形虽可晚至昭王时期,但所述事件可能多发生在康王时期。从考古材料看,胶东半岛典型周文化因素的出现也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这在归城遗址表现得最为明显^②。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铜器墓开始出现。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已有很多发现,如小刘庄、姜家、庄头^③铜器墓,其中小刘庄墓出土的启尊、启卣还记其随昭王南征之事,可见至迟在昭王时期,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纳入了周王朝的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者接受周王朝统治的,而此时期的归城遗址就是文献中的莱国所在。而这种统治,还可能东达海边的威海和荣成地区,这里也有西周早期偏晚铜器墓的发现^④。至于胶县西庵西周早期车马坑和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铜器墓^⑤,一方面说明周王朝对于胶东半岛的控制已向南扩展至此地;另一方面说明鲁东南大部分地区在西周早期不一定属周王朝控制地带,北边周文化因素的浸入要绕经鲁北才能逼近鲁东南地区,西边通过鲁南地区最多才东进至苍山附近。

目前已知鲁东南只有苍山东高尧发现有铜器和族徽^⑥,原简报最定在商代,但是从出土的铜甗、簋、尊看,都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器形,出土的细体铜觶多见于西周早期的丰镐地区而在殷墟罕见。同样的情况还有平邑洼子地、兰陵密家岭、兰陵晒米城遗址^⑦,出土的铜器可能都是周初的。平邑毗邻鲁文化分布区,兰陵晒米城在滕州史国西南,同时还出土有“史”铭铜器残片,因此周王朝的势力在周初可能已经渗透到平邑、苍山一线,其可以作为周文化在鲁东南东进边界的一个证据。从以上可知,鲁东南地区自殷墟晚期始就是土著文化控制区,西周前期更是缺乏出土单位明确的材料。但是文献和金文中均有关于莒国较早的记载,而莒国的地望一般认为是在鲁东南地区。出现的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可能由于鲁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涉及其他的学术问题。或许莒国在西周前期并不在此地,这里依旧是土著文化的控制区,目前还难以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进行辨识。

三、文化格局变动与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

很明显,由于商周之际的政权更迭,海岱地区各区域周文化演进的程度虽不尽相同,但文化格局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动。这样的变动,为我们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讨论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此我们也总结出了以下几点标准供学界参考。由于先秦时期,山脉对于人群的阻隔远大于河

^①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

^②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91年第10期;中美联合归城考古队《山东龙口市归城两周城址调查简报》,《考古》2011年第3期。

^③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王锡平等《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④郑同修等《山东威海市发现周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1期;威海市博物馆、荣成市文物管理所《山东荣成市学福村商周墓葬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9期。

^⑤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4期。

^⑥临沂文物收集组《山东苍山县出土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⑦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东方考古》(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流,泰沂山脉似乎一直是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因此这也造成了鲁南和鲁北地区晚商考古学文化的差异。因此,海岱地区商周分界的讨论,将在分区的基础上分别进行。

鲁北地区晚商时期族系关系复杂,商王朝还通过苏埠屯的君长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是,该地区除盐业遗址群以外的内陆高等级贵族和下层平民呈现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高级贵族商文化因素明显,像苏埠屯 M7 和寿光古城墓还是除殷墟以外唯一出土陶觚、爵组合的地点^①;另一方面,像大辛庄等一批鲁北地区的遗址出土的陶器等都地方化特征明显,典型的殷墟三期商文化的陶鬲还很常见,但是殷墟四期在殷墟最为常见的肥袋足鬲^②和三角厚唇簋却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普遍见于各遗址的一些近方体足部绳纹不到底以及绳纹已经到底的袋足陶鬲和大辛庄墓地常见的宽沿簋。而即便在高等级墓葬中,如苏埠屯墓地亦不见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这两类殷墟最为常见的器形。这两类器形的再次出现,如北沈马遗址^③,据共存器物可知时代都已经进入了西周。因此,有人提出的以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这两类典型商文化因素器物的出现作为商周分界的标准^④,在鲁北广大内陆地区可能依然适用。由于沿海的盐业遗址群生活的是一群以煮盐为业的初级手工业者,他们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人群,因此晚商时期几乎不受鲁北内陆遗址群的影响,并且还将他们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西周初年,所以上述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于沿海的盐业遗址。此外,由于会泉庄遗址的发现,可以明显地注意到晚商时期商、夷文化以潍河为界东西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的打破是在周初,且在最初阶段以夷文化对于鲁北地区的渗透为主。因此,以珍珠门遗址为代表的夷文化因素在鲁北地区的出现可以作为商周分界的另一个标准^⑤。所以,鲁北地区的商周分界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三条,其一,以联裆鬲、周式簋、铜鬲^⑥、銜铃^⑦、毁兵现象^⑧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可作为商周分界的第一个标准;其二,以乳状长袋足素面鬲、矮圈足素面簋等为代表的珍珠门夷文化因素在鲁北地区的再次出现,同样意味着该遗址及相关单位的年代进入西周;其三,鲁北内陆地区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的重新进入,亦标志该遗址及相关单位的年代已进入了西周。

鲁南地区从晚商开始,商文化的控制力明显衰减,遗址的数量也开始减少。而就在枣庄以南的徐州铜山丘湾祭祀遗址^⑨,还出土有一批晚商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其不属于商文化是可以肯定的。显然,如此规模的本地文化祭祀遗址,说明该遗址可能是迫使商文化推出泗水流域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前文已论,前掌大墓地的整体时代可能已进入周初,整个鲁南地区都罕见典型的殷墟四期商文化遗存。因此,在鲁南地区:其一,以联裆鬲、周式簋、铜鬲、銜铃、毁兵现象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可作为商周分界的一个标准;其二,随着周初周王朝对于殷商大族的册封以及授予姬姓封国的殷遗民在鲁南的进入,以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的进入,同样标志该遗址及相关单位的年代已进入西周。

胶东半岛在晚商时期属夷文化的控制区,并与商文化以潍河为界相对峙,因此该地区商、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均可作为商周分界的标准,所以商周分界标准可总结为两条,这两条均与鲁南地区第一、二条

①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在殷墟墓葬最为常见的肥袋足鬲在殷墟四期的整个海岱地区都很难见到。

③ 任相宏等《淄川考古》,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④ 张通《鲁北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 笔者在梳理了鲁北地区商代材料后,发现素面陶器作为岳石文化的子遗,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在大辛庄等遗址都有发现,且大辛庄遗址的发掘者还将其单独划分为“第二类遗存”。但是以珍珠门遗存、芝水二期遗存、会泉庄遗存为代表的相当于殷墟晚期阶段的夷文化器形却基本不见于同时期的鲁北地区,其在鲁北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

⑥ 曹斌《商周铜鬲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⑦ 孙机《中国古独轴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⑧ 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

⑨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

相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地区一直都是以浓郁的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导的,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外来因素的进入仅仅表现为绳纹装饰的出现,这在珍珠门遗址可以得到佐证,大量典型的周文化因素的涌入已晚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鲁东南地区由于晚商时期属土著文化分布区,目前亦无时代和文化属性明确的西周早期考古发掘遗物,假如未来考古工作普遍后发现无法辨识时代的遗存,我们在讨论商王朝南土时提出的三点商周分界标准^①将同样适用于该地区。

四、小 结

海岱地区作为商、周王朝的“东土”,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角色,而商周王朝同样对于此地十分重视。在商代晚期,商王朝册封殷墟商王陵之外唯一一座四条墓道大墓墓主于此,控制整个鲁北地区以及保证渤海沿岸、莱州湾盐业的生产 and 供给,夷人只能退守胶东半岛,以潍河为界与商王朝对峙。鲁南地区仍然是商文化的控制区,只是从殷墟三期始遗址开始凋零,殷墟四期几乎成为“空虚”地带。只有鲁东南始终是土著文化的分布区,且看不出文化繁荣的迹象。随着商周王朝政权的更迭和权力动荡,整个海岱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周文化开始强势进入海岱地区。由于鲁南地区的空虚,周王朝很快册封鲁、滕和殷遗史国至此,控制局面。鲁北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胶东半岛夷文化的趁机渗透,周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才最终牢牢地控制该地区。从目前的材料看,至少北至高青、南到淄川,西达济南、东抵昌乐这一范围都是齐国的控制区域。虽然夷文化在周初以向西对鲁北的入侵为主,但是至迟到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纳入周王朝的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阶层无疑是接受周王朝直接统治的。目前所知可能只有鲁东南西周早期时周王朝艰难地东进到苍山附近,文献中册封于此地的莒国似乎在考古中还难觅到线索。鉴于政权更迭引发的文化格局的变动,困扰学界已久的海岱地区商周分界问题似乎也可以在鲁北、鲁南和胶东半岛分别确认其标准。无疑周文化因素的强势进入可以作为海岱地区共同的商周分界标准,而商文化因素的再次进入还可作为鲁南地区和鲁北内陆地区的商周分界依据。此外,周初夷文化突破潍河对鲁北地区的侵扰也正是夷文化因素可作为鲁北地区商周分界的另一条标准。鲁东南大部分地区虽然目前缺少考古材料的发现,但未来如有类似问题,我们在讨论商王朝南土时提出的三点商周分界标准将适用于此。

商周王朝的政权更迭以及此时期的权力动荡引发的文化格局的变动,是西周王都以外地区的一个普遍的考古现象和学术问题。本文主要以海岱地区为例进行集中讨论,未来还会对西周王朝的西土、北土和南土进行分别论述。

[责任编辑:王 戎]

^①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